

# 我的83個月

崔武年 著

高文出版社

3011700000  
天地圖書  
COSMOS BOOKS  
\$ 128 00

ISBN 962-86699-4-X  
  
9 789628 669943 >  
定價: HK\$ 128.00

# 目 錄

我的“出版說明”…………… (1)

第一個月至第二個月

(1983年11月—1983年12月)…………… (9)

第三個月至第十四個月

(1984年1月—1984年12月)…………… (26)

第十五個月至第二十六個月

(1985年1月—1985年12月)…………… (110)

第二十七個月至第三十八個月

(1986年1月—1986年12月)…………… (203)

第三十九個月至第五十個月

(1987年1月—1987年12月)…………… (308)

**第五十一個月至第六十二個月**

(1988年1月—1988年12月)…………… (424)

**第六十三個月至第七十四個月**

(1989年1月—1989年12月)……………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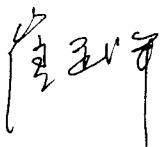
**第七十五個月至第八十三個月**

(1990年1月—1990年9月)…………… (629)

**遲寫的后記**…………… (640)

## 我的“出版说明”

——立此存照



寫完了《我的八十三個月》，馬上就為它寫個“出版說明”，這在我好象是迫不及待的事——因為有些話不吐不快，可是由于體例的關係，又祇能在“出版說明”裏說——且不管它能不能出版。

要寫寫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那一段日子的想法，在我是起自一九九七年，在一些朋友們和我提出，則要更早一些。後來我就動筆了，可是寫了沒多少，又攔住了。原因嘛，也不大，就是讀了一本，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實際上也沒全讀完，祇是跳躍着讀了幾篇，我就不想寫了。但是這個原因又很大：我在王小波的“精神家園”裏就是這麼隨意地蕩了兩、三步，我突然就很喪氣，我想說的很多相同意思的話，包括可以說出來的和使盡吃奶的力氣

也說不出來的，都已讓王小波說盡了！我還寫什麼意思！

當然，以後還是寫下來了，否則也不會有現在擺在諸位案頭的這本書。總之，一方面，所有的具體的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精神家園”，在這一點上，無論是什麼“偉大思想”、“統一意志”都不能代替的；再一方面，很多現代的中國人，從不同的生活經歷和不同的觀察角度，最後進入的“精神家園”可能都是獨立的、自由的、體現着個性的——借用一句成語，叫做“殊途同歸”。我覺得，僅僅爲了說明這一點，寫這本書也是必要的。

正如大家後來將看到的那樣，在這本書的寫法上，我堅持了“八字原則”，就是：真名實姓，真情實事。

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九零年九月，我有幸在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工作了八個年頭，要是以月計算的話，實際上是八十三個月——於是這“八十三個月”就成了本書的題目。我在組織部最大的官做到處長，有機會差點要升，終於沒有抓住。當時中國的縣處以上幹部有七十多萬，其中六十多萬是處級，所以，我並不怎麼顯要。但是我在組織部確實做了不少事，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以至至今還常被組織部的人提起。我自己想想，能做一些工作總是幸福的，在我，一要感謝組織部，在中國，它太有權威了，就象太廟裏的御筆石碑，誰遇見它都要肅然起敬，在它的光彩之下，我的確是光亮不少——雖然作爲現代人時興的是胸前戴一張小小的名牌，而不是背後豎一塊巨大的石碑；二要感謝我們那個集體，青年幹部局的人後來在官場上大多混的不很怎麼樣，但作爲一個職能機構，在它存在的那段時間裏，的確是不辱使命的；三呢，則要告慰一下我自己，因爲我還是努力了的，我還是盡可能的“修煉”了的，同時也

是盡可能的按照我自己的本色去想去說去做了的。有人說：你到中組部，倒真是“瀟灑走一回”！我回味一下，也真差不多。

現在回過頭來看，世界上的任何事和人，就其命題和形成來說，都是有一定的規定性的。比如傳統的中國人，比如近代的中國人，比如當代的中國人，比如你，比如我，比如他，等等。跟多數當代的中國人一樣，我是體制中人，與衆多的“體制中人”一樣，有時也真覺得“個中滋味，難以言表”。前兩年讀魯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有一封致胡風的信，一下子令我感慨不已！這裏，不妨引用一下——先生寫道：“三郎（蕭軍）的事情，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裏，出了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裏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却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但我確信我是對的。”先生說的有點刻薄，但是也正因為刻薄，所以才絕對的透徹。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相信“體制中人”們與先生這種感覺有共鳴的仍然不在少數。就我自己而言，不必隱諱，當然也屬於那些衆多的共鳴者之中。

後來我又想，老話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由此衡量，

我們的體制雖然給了人們這樣那樣的體驗，但是却長久不衰地延續了下來，近二十年來，還取得了令全世界都感到耀眼的偉大的經濟成就，這些，都不能不說它有相當巨大的“合理”性；合理性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規定性之中的，這種規定性就是所謂“存在”，這個“存在”就是世界、社會和社會中的人群——于是，我又想到：難道世界不是天天在變嗎？難道社會不是天天在變嗎？難道社會中的人群不是天天都在變嗎？過去是“合理”的東西，那麼，在變化了的世界中，在變化了的社會中，在變化了的人群的變化了的感覺中，就還是那麼“合理”或完全合理嗎？“規定性”改變了，“合理性”能由于一定要因為幾個“堅持”而維系它的“合理性”嗎？在人的生活中，有的體驗是所有人都要具備和經歷的，比如愛情、友情，等等——社會學家稱之為“原體驗”——即使是這樣的“原體驗”，隨着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它表現的方式、實現的形式也是在迅速地改變着的，像談戀愛，四、五十年前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到“洞房花燭夜”揭蓋頭時才有機會第一次看見新娘的芳容；過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自由戀愛”了，不過那也要有無數次的情書往來、約會考驗，才能有“拉拉手”之類的肌膚接觸；再過五年、十年，“情書”是很少有人寫了，經常的就是打電話，甚于“描眉”的親熱舉動，在公園裏、馬路上已經累見不鮮了；再過三年、五年，“網上戀愛”成為時尚，“試婚”、“性伴”、“先同居後結婚”等那些原本是“傷風敗俗”、“大逆不道”的“實現形式”就都為社會所接受了！等等。我們的體制給人的體驗是強烈的，但是，這些“體驗”到底不是那種“原體驗”，為什麼不能順應一下潮流，真正地改變一下自己，從而改變一下給



人的不那麼舒服——而且是越來越不舒服——的體驗呢？比如，已經是信息時代的執政黨了，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一元化”的領導形式？已經不是革命年代了，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革命年代建立起來的“組織原則”？已經不是封閉社會了，為什麼不能改變一下排他性的意識形態？人民和黨員的文化素質、政治眼界、精神需求、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了，為什麼還一定要跟上面的幾個人“保持高度的一致”？等等。

這些年來，我們的改革開放的確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可是，認真的衡量一下，就思想觀念的根本來說，我們走出了我們古代的老祖宗們“天不變道亦不變”、“綱常實千古不易”的“正統”觀念了嗎？我們超出了我們近代祖先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應變”認識了嗎？不言而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體用論”而言，中國近代的先驅思想家嚴復曾經有一段頗為精辟的議論：“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所謂“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技術”等都是產生于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體制，那些東西倒確實是沒有階級的規定性的，但是却有制度文化和體制文化的規定性；一方面說我們的制度最好、文化最優，一方面又要“學習”人家的管理和技術，加快速度地與人家“接軌，”同時還一定要指責人家的制度和文化“腐朽”，豈非持“牛體”而欲“馬用”？我不知道天底下是不是有這樣一廂情願的事。這個“體用”問題不就是一層窗戶紙的事嗎？中國有這麼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中國政府有這麼完善的研究機構，捅破這層窗

戶紙的條件應該非常完備，可就是捅不破——可能這裏面又是一個“體用”問題了！

當然，現在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了，很多事情也不用我來嘮叨。中國人是講究所謂“中庸之道”的，大家心知肚明也就相互都可以交代了。打一個大而有當的比方：就象我們說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而無產階級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樣——實際上——注意：我說的是“實際上”——就我們黨的成份、組織及發展沿革而言，讓她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在有些太累；而在我們終於“發現”“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之後，無產階級也就很難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煌然于世了——其實，就無產階級自身的生活條件和社會條件而言，讓她最先知道“生物技術”、“基因工程”、“航天飛機”等等，也確實勉為其難！所以，讓無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基本上祇有理論上的意義，而無實際上的價值。不錯，先進生產力（比如科學、技術、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等）是由勞動者掌握的，但這裏的勞動者主要是指知識分子，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人和農民——令人欣慰的是，對這一點，現在大家已經不再回避了。如果我們的認識再往前走一步，甚至還會驀然感到：討論什麼誰的“先鋒隊”、誰是“代表”都意義不大，因為人群好象并不是以“階級”劃分的，人類社會也不一定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等等。總之，好在社會總是在前進，歷史總是在向前發展，大概越是往後，中國越是現代化，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和不言自明的東西就越多。這就好象馬克思說的，那個什麼階級在“創造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生產了它自己的“掘墓人”——這句話與我要表達的意思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走得越遠，離現代化的目標越近，則離自己被埋葬的日子越近。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對《黨章》學習的一般，但是，我想，如果真是發生了這樣的“沒有辦法的事情”的話，對我們這個總是講究“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立志“解放全人類”的黨來說，倒却是合乎本意的。

噢，話說遠了。前面我說了，我是“體制中人”。所以，我還是希望我們這個體制好起來，能成為人民真正擁護的體制，能成為真正生機勃勃的體制，能成為真正勝似西方的體制。所以我說了這許多，所以我寫了這個《我的八十三個月》。我把我的感受和我的看法都寫進了這“八十三個月”裏，或者說，這“八十三個月”的生活內容就鑄就了我的如許的感受和看法。如果眼前有什麼不“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先“不一致”一下吧——從最終目標上說，還是“一致”的。

最後，我再說明四點：第一，這裏說的僅僅是我個人在青年幹部局的工作和體驗，而不是青年幹部局本身的歷史；因為這些都是個人的工作和體驗，我堅持了自始至終的“真”和“實”的原則。第二，在本書裏面我說到了大量的人名、時間、地點和事件，這些都是真的，確實有的，就是說，在某年某月某日，就是這些人在這個地方參與了這個事情。倘若這裏面提到名字的朋友當時有記錄的話，可以找出來對照一下。第三，正因為是“真”和“實”，就產生了是不是有“泄密”之嫌。為此，我專門查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依法衡量，沒事。那些事情距今已有十餘年的距離，一方面是已經事過境遷，說說也無妨了；一方面是已經人事更替，

再不說就該被忘却了。第四，就所謂“著書立說”而言，任何人的觀察都是有局限性的，不管他占有的資料是多麼完全，他聲明他的觀點是多麼客觀；而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是這樣的：不向其他人請求任何回憶和材料方面的幫助，不查閱除我手頭現有資料以外的資料——我要表現的就是具體到“我”的體驗和看法，主要是“我”在當時的體驗和看法——我想，如果我當時跟現在一樣了解更多的情況的話，我的體驗和看法可能就不是“當時”的體驗和看法了。

以上，是為我的“出版說明”——但是，書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出版，所以，也同時就作為“立此存照”。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于北京花園橋下

# 第一個月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我是這個月中旬正式到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工作的。去報到的那一天我至今還記憶清晰：那天挺冷，是個陰天，沒有太陽，風還挺大，我騎着車子沿西單北大街往西單商場北邊那個灰色大樓走，蹬得挺快，沒戴手套。我心裏是一片陽光燦爛！我的心裏哼着“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翻來復去就這麼兩句，但不覺得重復。大概是一九八二年吧，忘記從哪個朋友那裏就聽說過中央組織部有個青年幹部局，是剛成立的，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的接班人問題，等等。對此，清高點兒講，我很感興趣，要是說句真心話，我得說，我願意幹這個活。現在，我終於如願以償。

按說，照組織部的標準，象我這樣的人是不很適于進組織部的，什麼道理呢？在當時來講，從檔案材料上看，我雖然還是“一身清白”，比如插過隊、當過兵、做過工，“文革”表現還可以，“四五”以後先被批鬥、後被平反，又剛剛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補了個必不可少的學歷，年紀歷，三十五歲，又有一腔的忠誠、一腔的熱情，擺在桌面上還過得去；但是，我也知道，我這個人傲氣，說話衝，脾氣不好，主見性太強，愛得罪人，總讓人感到不那

麼“馴服”，如果到單位的人事部門去了解，說的壞話肯定比好話多，等等。但是，我還是進了組織部。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這麼幾個因素起了作用：一是年初時我代替胡昭衡的秘書隨胡昭衡一起參加了中央機構改革工作組，在新疆呆了三個多月，幹得還不錯，受到代表中組部參加工作組的胡光偉的推薦；二是幾個月前我曾署名給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局長李銳寫過一封信，是建議中央要好生對待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時的那些人，我講他們都是“過來人”，那時能拍案而起，不懼生死，後來被抓、被鬥，又被平反，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前兩年又考上了大學，現在正好接近畢業，又正當而立之年，我講他們是有思考、有擔當的一批人，應該專門研究，應該整體使用，等等。據說這封信引起了李銳等領導的重視；三麼，應該是當時的大氣候，好象大家都想幹事情，有那麼多的事情幹不完，中組部的胸懷好象是建國以來最開闊的時期之一，好象也願意更換些新鮮血液，再加之具體經手考察、調查的又是青幹局的同志——後來我知道，直接去考察的是李志民和張潔瑜——而他們的觀念確實也解放得多。總之，經過了四、五個月的時間，經過了一些可能是十分嚴格的研究、審批程序之後，我進了中央組織部，並且進了青年幹部局。

工作調動雖然如願以償，但當時我的心情却總有些莫名的抑鬱。抑鬱什麼呢？抑鬱“清污”，就是那個“清除精神污染”。剛剛開過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兩大舉措：整黨和“清污”。對於整黨，我覺得很有必要；對於“清污”，我懷有深深的疑慮。一方面講，作為一個講原則、有紀律、負有重大責任的黨來說，淨化一下它所堅持的意識形態倒也無可非議——如果這個“精神污染”的內涵和外延能夠界定清楚的話，如果這個黨的成分真的夠純、紀律真的夠嚴的話——但是，現在遺憾的是，可能什麼屬於“精神污染”、什麼不屬於“精神污染”祇有少數“專門家”們明白，而大多數黨員和大多數老百姓不是“專門家”，他們是不會明白的；更

何況剛剛經過“文革”，這個黨的成分還不是那麼純、紀律也不是那麼嚴。再一方面講，還有一個時機的選擇問題，整黨剛剛展開，極“左”的思想體系在黨內還盤根錯節，極“左”的習慣勢力在社會上還有持無恐，充斥著極“左”內容的政策條文尚以“紅頭文件”的形式被貫徹執行！而且這個所謂“精神污染”講到底就是個意識形態概念——天知道這個“污染”會包容些什麼！這個“清污”會清什麼！我仿佛看到相當數量的極“左”佐吏們又在大拍胸脯說他們如何如何“正確”，表示“早該”如何如何採取措施了——但是，恰恰是這些在數十年極“左”空氣中熏染升遷的、並且是還都是挺符合標準的“幹部黨員們”或“黨員幹部們”的意識觀念襯托了某種“污染精神”。而且，這個“清污”是個黨內決定，但“清”的又不是黨內之“污”，而主要是黨外之“污”、是黨所認定的社會之“污”，這是于法于理說不過去的。在十二屆二中全會期間，我曾經就許多問題和我父親較為廣泛地議論過，他對我的一些想法也不置可否。從這裏面，我感到，不管是老一輩的共產黨員還是年輕一輩的共產黨員，祇要是正派的、正義的、經過“文化大革命”磨難又真正擁護三中全會的，他們的好多看法在一九八三年時都比較趨同。

就在那個刮風天的上午，我懷揣蓋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大印的中組部（83）幹調字299號調令，邁進了西單商場北邊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大樓。

是青年幹部局局長李志民接待的我。和李志民，我是第二次見面了：今年七月間他和張潔瑜找我談過一次話。不過，那次是考察，這次是介紹工作，情況完全不同了。李志民這天的談話使我很長一段時間激動不已！

李志民說：歡迎你到中組部青幹局工作，準備分配到一處。青幹局現設三個處，即綜合處、一處、二處，一處管部委，二處管地方，現在加你十五個人，人不多，任務很重。當前工作主要有五

## 第一個月

項，第一是建立省部級後備幹部隊伍，也就是“第三梯隊”，共一千人左右，這一千人的名單要在明年“七·一”前報中央；第二是做好“記錄在案”工作，所謂“記錄在案”就是對“文革”期間在校的大學群眾組織頭頭當時的表現、現在的去向等主要情況記錄在案；第三是從大學應屆畢業生中選調一批較優秀的（以學生幹部為主）直接派到基層去鍛煉，以增長才幹，培養使用；第四是通過各種渠道從中央國家機關組織一批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幹部到地方下派鍛煉；第五是研究、建立後備幹部制度，包括隊伍制度和工作制度，督促、檢查落實情況，提出建議，推動工作。

李志民說：青幹局工作有虛有實，虛的是研究制度，實的是管好隊伍，也就是管好一千個人。在組織部裏，青幹局的工作應該更加着眼于未來、着眼于基礎、着眼于制度、着眼于國家的長治久安。與組織部的其他局相比，青幹局的長處是舊東西少、老框框少，有一些討論的空氣，不那麼沉悶，責任感強，工作有主動性、有使命感；不足是缺少經驗、缺少組織部門的工作知識，熱情有餘秩序有缺。

李志民說：現在我們黨剛剛從“文革”的泥沼裏爬起來，我們國家正面臨着百廢待舉的局面，需要有這麼一些人去埋頭苦幹、去拚命硬幹！我們青年幹部局就應該做這樣的一些人，就應該為國家去選拔、去培養這樣的一批人。

李志民對我說：你是學歷史的，過去沒有做過組織工作，這沒有關係，誰也不是天生就會做的，注意學、注意體驗就是了；你有一種主動精神，我們看中你的就是這個主動精神，你來了，對你的要求就是要主動，主動提出情況、主動提出建議、主動提出分析性的意見，而且要注意主動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現在的工作。

等等，還有很多。

反正是李志民的這番談話着實讓我激動了好一陣子！我在心裏說：這就是青年幹部局的風貌！這就是新時期組織部門的風貌！那



時，我參加工作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對各種層次的領導幹部也接觸過一些，中組部青幹局局長李志民的風采真令我耳目一新！我覺得真可以好好幹一把了！

這個月剩下的幾天主要就是熟悉情況、接觸工作、學習文件了。在開始的兩三天裏，我認識了青幹局在家的全體人員：綜合處處長張潔瑜并張鴻興、呂俊英；一處副處長霍銀海并徐功廷、朱雅芝；二處處長劉廣祥并閻淮、馮紹亨、韓學林。副局長劉澤彭出差、綜合處副處長彭守範抽調到整黨辦、一處幹部蔣延東脫產讀大專我沒有見到。霍銀海領着我辦了工作證、領了文件夾和工作筆記本、買了飯票，徐功廷帶着我到辦公廳秘書處、值班室、財務處、圖書室及食堂、醫務室等處轉了一圈，認了一下地方。我很快就在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令我欣喜的是，在中央組織部的機關圖書館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的書！第一天的中午飯是霍銀海給我借了一個碗吃的，不貴，但吃的是什麼就忘記了。我的辦公桌是早幾天就領來了，放在一處的辦公室裏，我坐在我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裏面是空的，不過沒關係，它會充實起來！有一節文件櫃是指給我用的，當然也是空的，不過那時我不知道我會往裏面放些什麼。我來這裏的時候雖然已經是個“副處級幹部”，但這是中央組織部，是中國的“六部之首”的“吏部”，我這麼個小幹部算什麼！而且還不知道人家認不認；我是個新同志，現在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懂，什麼話也插不上，不過我心裏知道，我會很快就入門的——因為這種情況我已經經歷過兩次了，一次是在工廠，一次是在機關，我知道這時候主要靠自己體驗，而且我也知道應該如何去用心體驗。我坐在辦公室裏，聽處裏的同志談天、說事、議論工作，翻翻處裏可以翻的各種文件，有時也到別的處的辦公室轉轉——我就這樣成了中組部的正式幹部。

呵，最開始的記憶！最開始的記憶真是美好！在我最開始的記憶裏的中央組織部真是美好！我走近這座灰色的大樓，邁入這道鑲